

懷念呂實強老師

黃英哲 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暨大學院中國研究科
教授

9月初，為了邀請呂芳上教授出席今年的日本現代中國學會年會，並就年會主題「反思辛亥革命100年」做專題講演，而頻頻與呂先生以電子郵件相互聯絡，5日上午，呂先生在電子郵件上突然告我呂實強老師在4日晚因車禍過世。我頓時之間難以置信，但是隨即又收到許雪姬教授傳來的呂老師的噩耗，始確定呂老師真的不在了，內心一片茫然，離最後和呂老師聚餐的8月19日，才短短兩個星期。令我難忘的是，8月19日聚餐時，呂老師注視了我一陣之後，用著關懷的語氣告訴我：英哲，你看起來顯得有些疲憊，你也不年輕了，以後要多注意身體。從年初，呂老師屢在我打給他的國際電話中說：等你暑假回來後，再找你的幾位同學一起聚餐。8月上旬返國後，立刻打電話給呂老師，約了19日中午在中研院附近的家樂福餐廳聚餐，呂老師認真打了電話給平常幾位較親近的學生，結果都因家裡有事無法前來，最後一起聚餐的是在中研院近史所服務的增富兄與我。雖然只有三人，呂老師仍然很高興的點了不少菜，用餐時呂老師也聊到幾位較有來往學生的近況，並表示他目前的身體狀況應當可以再挺個幾年，我則說：老師的身體不會有大問題，就等著給老師做八八大壽。呂老師一向討厭繁文縟節，卻微笑的表示到時再說吧。席上，呂老師特別交代這回我返日後，設法幫他打個電話給他省立師範學院（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時期的同學水野明（本名李明，愛知學院大學

退休教授)，請他若再到臺灣一定要聯絡，他打算聯絡幾位師院時期的同學聚一聚，結果我這個電話還來不及打，呂老師就遽然過世。聚餐後，呂老師舉著蹣跚的腳步，牽著破舊的腳踏車，一步一步的慢行走回家。我和增富兄不太放心他一個人回家，發現他過馬路時行動很慢，過紅綠燈時，步履維艱的走到一半，綠燈卻早已變為紅燈，視力早已衰退到看不清楚過往的車水馬龍，似乎也沒聽到駕駛沒有耐心的喇叭聲，我和增富兄急著衝到馬路中央扶著他過馬路，過馬路後，他依然堅持要一個人回家，我和增富兄商量，因我有事需先離開，增富兄則偷偷的跟在他後面，直到他抵達公寓門口安全上樓後才回去上班。

呂老師一生可謂是特立獨行，師院畢業後，除了短暫在中學任教外，一生都在中研院度過，致力學術研究。在學術界裡，呂老師是一位獨行俠，雖然也指導研究生，卻不立門戶，不開山立派，和他最親近的學生幾乎都是他師大歷史系夜間部的學生，我也是忝為他師大歷史系夜間部的學生之一員，從不敢妄稱是他的「弟子」，我想呂老師大概也不會喜歡有幫派意味的「弟子」這兩個字的。我只想從一個平庸學生的角度，紀錄與呂老師三十多年之間的來往點滴。

從小學開始，我就對歷史與文學產生極大興趣，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就讀大學的歷史或文學相關科系，最好能成為李敖或白先勇或於梨華的學弟。1976年歷經三次聯考的

挑戰，勉強的擠進師大夜間部歷史系，高高興興的入學。當時師大日間部與夜間部的唯一差別是日間部享有公費與分發，夜間部則沒有，但在師資上則全都相同。我和呂老師相遇於大二的「中國近代史」這門必修課上，本來「中國近代史」的課一向由李國祁老師擔任，但後來他因公務繁忙，因此就延請當時擔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的呂老師來任教，當時呂老師教我的時候大約是我現在的年紀。呂老師的「中國近代史」從明末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開始講起，滿口的山東口音，對於來自南臺灣鄉下的我的確是一大考驗，一直過了半學期才慢慢習慣這種山東腔國語。呂老師的授課內容非常充實，特別是針對西方勢力侵入中國後，清廷與中國有識之士的反應都巨細靡遺的講授，講到太平天國之亂洪楊革命時也不流於情緒性的批判，一年下來，我的「中國近代史」有了一定的基礎。

我的大學生活是臺灣社會變化急遽的70年代後半，70年代的幾幕場景至今仍記憶猶新——軍訓教官帶著我們到松山機場蛋洗美國特使克里斯多福、陳鼓應與陳婉真搭檔競選增額國代、楊遠背著小包袱北上為二陳助選、知識分子不分族群和立場，為了環保、勞工、民主（言論思想）、民族（中美斷交）諸問題團結一致向威權體制與國際社會發聲。但是因中美斷交之故，社會普遍高漲的民族主義熱潮一度壓倒一切，影響所及，我除了對「中國近代史」，也對「中國

現代史」產生極大的興趣，特別是「五四」前後的文學與思想，當我向呂老師談起我的關心時，他除了要我去閱讀胡適的文章外，還帶我到中研院近史所圖書室介紹我閱讀當時還被列為禁書的《新青年》與《魯迅全集》、《獨秀文存》、《李大釗文集》等相關雜誌、書籍，甚至還偷偷的出席近史所研究人員的定期研究報告，激發了我的學者之夢。大三以後，每週至少一回來往於師大和舊莊中研院的路上，生活覺得非常充實。

大五時（夜間部要唸五年），我決定要投考研究所，可是不幸落榜，回顧我自己的前半生，在我拿到博士學位之前，落榜的次數真是不勝枚舉。大五那年，呂老師突然的被當時中研院院長錢思亮先生任命為近史所所長，他獲知我研究所落榜之事，叫我去找他，見面時，淡淡的說道：我給你在近史所安排一個臨時助理之職，在資料室剪報，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再準備研究所考試。就這樣，我有了機會進入當時臺灣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邊工作邊準備考試。從81年到近史所當臨時助理至85年春天出國唸書前，是我前半生最快樂的時光，整天徜徉在學術的大海，接觸到相當多優秀的學者，也受到不少薰陶，「南港學派」的實證主義研究成為我一生的研究指南。當時，中研院內還未大興土木，到處是清一色的樸實二層樓研究室房子，院內還有未完成徵收的水田農地與紅磚小農舍，好令人難忘的一幅田園風景。呂老師一共當了兩任所長，所長任內，因長

年用功甚勤與個人家庭因素，加上中研院內、所內一些人事的上下相逼，不勝負荷，導致兩度視網膜剝離住院開刀，所幸有副所長張玉法先生頂著，所務運作如常。呂老師與張先生兩人惺惺相惜，互相信賴，為近史所立下了極佳典範。在近史所期間，我親眼目睹了呂老師的用人哲學，呂老師用人極為重視品德，他會透過各種管道設法打聽應徵者的風評，他一向認為學問與道德是不可分的，若二者須擇其一，他也寧願選擇品格道德，此外，他雖是國民黨員，但不介意應徵者的省籍族群、黨派、出身學校，只要應徵者品行端正，學術方面也有相當的成就，他都會在所務會議上予以推薦，尤其是應徵者莫名其妙被安全單位扣上帽子時，基於愛才，他也都會主動設法替他們解套，維護學術淨地與堅守學者的自由主義精神。

85年春天，我終於踏上留學之途，因為我辜負了呂老師的善意安排，考了幾年終究還是沒有考上國內的研究所。來日本求學的第一年，我給呂老師寄了賀年片並披露自己對臺灣時局的看法，呂老師在給我的回信上說：

近來賀年片紛紛而來，對我來說並不會感到溫暖，反而是增加了負擔。我在社會中，雖然是看來還活躍，實際上我從來不主動的去交際。我發賀年片，這幾年只有兩份，一份是郭師母（筆者按：郭廷以教授夫人），一份是香港的張基

瑞老師。(略)

您的情形，只有把握一個目標去努力吧！幾年來在中研院，我的想法與做法，您都很熟悉。在這裡，我也沒有新的看法了。總之，一切多自我努力，不要去多和別人比，「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要改造社會，造福人群，也必須顧及到大體，千萬不要認為推倒某些障礙，就會天下太平。您看，辛亥革命，北伐統一，抗戰勝利，都顯示出中國的多災多難，真是需要許多默默耕耘的人，往基礎建設。自立而後立人。您多去體會吧！

當時我在T大當旁聽生，日本的研究所入學制度是先當旁聽生，再參加入學考試。因為一開始申請到的專攻並非我所長，加上日文還不夠好，致使精神非常不穩定，計畫轉到別的專攻或轉學，多次寫信和呂老師商量，在信上他寫著：

我的見解，過去數年來，我們已經談得太多了，不必重述。我想我應該在這裡再行略提的，是我們必須把握時間，充實自己，**not lose a day**。時間過得太快，一蹉跎真是一大段，永遠無法彌補。人之能否愉快，最恆常的事，便是每天過得很正常，很充實。不論貧富，不管職業及地位，便能盡其在我，苦惱應可去其大半。(略)

不論您是否能轉學，都應該把握時間，培養自己。真的不要花費時間在與朋友相酬應或對那些我們無力參與的國家大事去過問太多。總之，您必須去達成您自己的目標——努力獲得成績與學位。

有任何認為我可以協助的地方，都可隨時來信，我必盡力辦理。不要因為離開遠了，心理便遠了。我的許多老同學昔年流亡學生時期的好友，迄今雖已睽違40年，但內心的關懷與想念，並沒有絲毫改變。

在我轉學失敗後，呂老師立刻又修書一封寄給我：

對所有的波折，也不要先只怪運氣和環境，事實上也必須時常考慮到自己本身的條件。一個中人之資，想要有所成就，只有加倍的努力。反之，能加倍的努力，中人之資，也往往都可以有上人之資的成就。對於讀書，實在沒有什麼奧妙，就是長期持續的努力而已。我本人走過的路，就是一個適當的例證。過去多年來，不僅我們談的話很多，而且你也可以看到我的生活，我一切很少改變，做所長前、期間、後，在本質上，我絕沒有改變，依然是這樣，依然是這樣的一個我。一般人也弄不清楚，還認為我有些才氣，事實上我每次寫文章，都是從痛苦中掙扎出來的，絕非易事。

長期的努力，點滴的相繼收穫，累積下來，自然也很可觀了。

在東京都東邊的I縣T大當了兩年旁聽生後，兩年的入學考試皆落榜，我只好又再繼續申請別的大學當旁聽生，呂老師二話不說又幫我寫推薦信。轉學到東京都內的K大後，選擇了我喜歡的專攻，指導教授Y教授是位望重學界的洵然君子，對我相當照顧關心，我也下定決心重拾舊山河。但是那時臺灣正面臨威權體制開始動搖，解嚴、反對黨的成立，臺灣正要邁向一個新的時代，我蘊藏很久無法理喻的熱血又再度沸騰，我想學習五四青年，希望能夠加入改造臺灣社會的行列。我斷斷續續以筆名在海外、臺灣島內的反體制雜誌及報紙，發表「革命文學」，我又無心讀書，打算「投筆從戎」，呂老師在接到我充滿焦慮與亢奮的信後，立刻回了我一封信：

收到您6月4日的信，我心中很有些焦急，因為您從最近一直都在depression當中。這必須以不斷的提高自己的境界，堅持自己的信心和持之以恆的努力來對抗。誠然好像是一甚至實際是永遠不能夠治好，但卻不得不自強不息的去治。這種對抗的過程，從反面看，仍然是一連串的挫折，但從正面看卻有著一連串的建樹。因此，挫折並不可怕，成就也無可驕，把他們連貫起來，便可以繼續的生存下去了。

您所說的「讀書不成，學劍去也！」這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學劍固未必有成，有成也未必能解決問題。在我看來，您還是繼續讀書，決不會不成的。您花了幾年的時間，多少挫折與困頓，好不容易才總算有了一個開始，如何可輕言放棄，難道您真的能捨得放棄您長期以來用血汗所成就的一些基礎嗎？人生看起來很長，過起來也很快，把握一條路子，朝向一個方向，不論遲速曲直，總是有所進展，有所建樹的，不能經常蹉跎，一過去便不再來，那才是流失了。「德惟一動無不吉」，您仔細琢磨書經上這句話，好自為之。

我們真理想與抱負要改造社會、政治，只有先把自己健全起來，能自立才能立人，不然，依運動與打倒別人起家，怎能免除不打倒一個又來一個同樣的呢？

東京兩年的生活，我確實曾一度痛下決心要好好專心讀書，可是又遭逢家庭變故，不知不覺當中罹患了嚴重的躁鬱症與失眠症，決定告別關東的留學生活，最後又是呂老師幫我收拾殘局，向當時提前自國立大阪外國語大學退休，轉到關西大阪的追手門學院大學任教的伊原（彭）澤周教授推薦，正式入學該大學研究所，我的留學之路從此步上正軌，而當初辜負了K大Y教授的入學期待，至今仍深感愧疚。

到我步上留學之路正軌之前，呂老師寫給我的十幾封信我一直保存的很好，至今每遇人生偶有困頓迷惘之際，我總是會再拿出重溫一遍，當作為人處事與問學的方針。留學後半我相當順利，陸續在日本學術性刊物發表論文，在博士論文審查期間，即在日本覓得教職，除了伊原澤周老師以外，北岡正子老師、中村喬老師、松本英紀老師等多位日本老師的師恩，我終生難忘。但是如果沒有自始至終從沒放棄過我的呂老師的鼓勵，

我的人生際遇將會有很大的不同，這幾年我深深體認到呂老師對我的現狀非常安慰，每年返國時一定都會去探望他，有一回他突然告訴我：英哲，我也沒有料到您今天的發展。我回答說：因為我時時刻刻牢記老師常告我的「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德惟一動無不吉」，而且我知道自己是「中人之資」，必須加倍努力才行，不過我從來不敢奢求有「上人之資」的成就，呂老師開心的微笑了。